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國學

第二卷



巴蜀書社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新國學

第二卷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責任編輯：王大厚

封面設計：李文金

新 國 學

四川大學中文系《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市鹽道街3號 郵政編碼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6658275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福利東方彩印廠印刷

成都市武侯區機投鎮潮音工業小區 (028)7445573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4.25 字數：338千

2000年10月第一版 200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冊

ISBN7-80659-144-3/1·48

定價：30.00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聯繫調換

目 錄

21 世紀先秦文學文獻研究構想	許志剛	1
文獻與學術	劉 石	13
歸於平淡後的思考	劉躍進	20
《淮南鴻烈》簡端記(續)		
..... 向宗魯遺著 屈守元整理 黎孟德輯錄		29
《廬山遠公話》新校	項 楚	49
蘇詩“聯翩閱三守”考辨	馬德富	67
《杜家立成雜書要略》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臺灣)王三慶	74
晏殊《類要》研究	陳尚君	83
漢樂府的藝術體制	錢志熙	110
季子多金與青雲自致	王 紅	129
——從高適詩看盛唐士風的一個方面及其精神來源		
杜甫邊塞詩及其價值評判	劉 藝	140
理學家的詩情	莫礪鋒	155
——論朱熹的詩歌創作		
論南宋蜀僧寶曇居簡的文學成就	祝尚書	179
高啓死因試探	房 銳	201

清代兩種對立的宋詩觀述評·····	呂肖奐	219
——《宋詩鈔》與《石洲詩話》比較研究		
南方經濟文化的興起與宋詞的繁榮·····	金 靜	231
元代詠物詞初探·····	(臺灣)范長華	245
試論《廬山遠公話》的藝術手法與構思·····	李 昊	261
唐人仙道類小說研究·····	(臺灣)劉惠萍	289
俄藏敦煌寫本《雜字》研究·····	(臺灣)朱鳳玉	305
敦煌文獻中的佛教禮懺儀·····	(臺灣)汪 娟	326
《賢愚經》與文學及壁畫的關係·····	(臺灣)梁麗玲	346
論隋唐三階教與淨土教的關係·····	劉長東	364
選官不如選佛·····	譚 偉	382
——試論唐代後期政治與佛教之消長及其原因		
《宋書·夷蠻傳》與夷夏論·····	(香港)范家偉	392
《太平寰宇記》史料價值述略·····	(臺灣)廖幼華	407
論南宋滅亡的主要原因不在財政問題·····	張金嶺	426
——以二王流亡政權的物資來源為例		
世界華僑華人寺廟宮觀研究的開拓性成果·····	張子開	436
——評段立生教授的新著《泰國的中式寺廟》		
編後記·····	《新國學》編輯委員會	447

21 世紀先秦文學 文獻研究構想

許志剛

20 世紀的先秦文學研究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這同先秦文獻研究中的突破性進展有着直接的關係。尤其值得重視的是 20 世紀在考古學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給予先秦兩漢文化與文學研究以極其有利的條件。充分認識考古發現給予先秦文學文獻方面的影響，可以更清醒地總結 20 世紀學術研究和學術思想的發展，也有利於自覺地確定 21 世紀先秦兩漢文學和文獻學研究的發展態勢與未來格局。

一、出土文獻與文獻學的新課題

王國維說：“自漢以來，中國的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中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①

誠如其所言，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有關文獻古籍方面的重要發現，都給予當時的歷史研究、文學研究、文獻研究以極大的衝擊。然而，以往的發現，包括王國維所見到的甲骨文、漢晉木簡，同 20 世紀後來所發現的出土文獻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語。20 世紀考古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數量之多，價值之重要，遠非他所能預見得到。

20 世紀的考古工作，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考古工作，爲人們認識先秦乃至秦漢的歷史、文化和文學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大批商、周、秦、漢墓和建築遺址的發現、發掘，衆多隨葬器物的出土，使我們直接了解到古代人生活的一些真實狀況，對制約他們精神活動的物質條件也有了可靠的證據和直觀的感受。

從先秦文獻的角度來說，20 世紀第一個重要的突破當屬甲骨文的發掘與研究。據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的《甲骨文編》（中華書局 1965）稱，在大半個世紀中所發現的甲骨片多達 15 萬片。學術界充分運用了這些卜辭的史料價值，將其用於商代歷史的研究。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李學勤、彭裕商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是這方面研究在不同時期的代表性成果。

商周青銅器的發現遠非 20 世紀的事。然而，充分發掘這些彝器及其銘文的學術價值，將其用於歷史的文化的研究中，則是 20 世紀在青銅器研究方面的新的進展。這些彝器上的銘文是當時歷史的真實記錄，是可補歷史文獻之不足的無價之寶。因此，學術界對這些珍貴的特殊形態的文獻進行考釋、識讀，同時，也更多地將其運用到歷史及其各個分支學科的研究中。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陳夢家的《殷周青銅器通論》等著作，直接論述了青銅器及金文的學術意義。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許倬雲的《西周史》、宋鎮豪的《夏商社會生活史》、張之恒和周裕興的《夏商周考古》等著作都在歷史研究中充分運用了考古成果，在發掘並運用金文的文獻價值方面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在先秦文學研究界，也有些學者作出了同樣的努力，並取得了可貴可喜的進展。如于省吾的《澤螺居詩經新證》將金文與古文獻相互印證，以研究詩、騷，每每發前人所未嘗發；丁山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則運用了大量古文字資料；陸思賢的

《神話考古》從原始崇拜的圖騰柱入手，根據考古實物資料和文獻記載，對中國上古神話進行了大膽的探索；日本學者白川靜的專著《詩經》中引用了很多金文，增強了其論著的說服力。

周代彝器中有銘文者達數千件，有的銘文篇幅較長，如《毛公鼎》長達 497 字，其它二三百字的也很多。僅從字數的多少說，它們已經超過了先秦時代的一些文學文本。至於其內容，有些文本可以同《詩經》、《尚書》相印證發明，有些器物的銘文本身就是一篇文學作品。充分認識這些金文的文獻價值和文學文本意義，是擺在學術界特別是先秦文學研究面前的新的課題。就這點來說，文學研究界比歷史學界的努力尚有很大的距離。于省吾等人的研究之所以可貴，除了在一些具體問題的闡釋方面取得了有說服力的成果外，他們的學術實踐所帶來的啓迪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他們比漢代、宋代經學家或者清代諸儒的視野更加開闊。

與金文文本相比，竹簡、帛書則是另一個豐富的文獻寶庫。如解放後出土的居延漢簡多達 1 萬 9 千餘枚，爲有史以來出土簡牘數量之最。而山東臨沂銀雀山 1 號漢墓、河北定縣 40 號漢墓、長沙馬王堆 3 號漢墓、湖北荊門郭店楚墓等，都出土了大量非常重要的古代文獻。其中既有傳世古籍的重要鈔本，如雙古堆竹簡《詩經》、馬王堆帛書和郭店楚簡《老子》等，也有久已亡佚的文獻，如《黃帝四經》、《孫臏兵法》等。

從先秦文學文獻研究的角度看，竹簡、帛書中的古代典籍的發現具有特殊的意義。

二、疑古辨偽與雙重證據法

在中國學術發展中，疑古辨偽之學曾產生過極大的推動作用，使人們不再以迷信的、盲目的態度對待古代文獻和古人的經傳說教。這種態度和方法在現代學術發展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

的。疑古者在判定古書的真偽時，或以語言文字運用的精粗爲據，或以兩書文字相同相異的比較爲說，或以其人、其事是否見於某書稱引爲準則，以這樣冷峻、嚴格的態度治學，的確揭開了某些歷史疑案，如著名的偽《古文尚書》的研究與考辨，其方法、其精神很值得學術界繼承、弘揚。

然而，疑古辨僞之學也帶來了一定的後遺症，即一些人輕率地懷疑、否定古代文獻，甚至毫無根據地妄下斷言，以主觀臆說取代嚴肅的學術研究。這種傾向給予先秦時期的歷史、文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如姚際恒在《古今僞書考》中論及《孫子》的結論是“未足定其著書之人”，甚至懷疑孫武其人之有無。

在這方面，影響更廣、更大的個案當屬《左傳》。從清代的劉逢祿到康有爲、崔適，前後相承地考辨，認定《左傳》爲劉歆所作僞而成。錢玄同甚至認爲：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的辨僞的價值，“實與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相埒。閻書出而僞《古文尚書》之案大白。劉書出而僞《春秋左氏傳》之案亦大白。”^②於是，《左傳》之爲僞書似乎成了不爭的事實。然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記載春秋間大事的古佚書，整理者考訂爲《春秋事語》。此書一出，很多學者撰文指出其與《左傳》的關係，足以證明《左傳》之不僞^③，由此可見，出土文獻在解決文獻學中千古疑案方面具有其它任何資料都無法比擬的作用。

現在，隨着大批竹簡、帛書的發展、整理，一些沉埋千載的古籍擺在面前，迫使人們重新審視那些似乎早成定案的結論。銀雀山漢墓出土了大批被斥爲僞書的古籍，其中有《六韜》、《尉繚子》等，尤爲重要的，足以解釋百年疑竇的是《孫子》和《孫臏兵法》的發現。它使人們確信疑古之說的很多結論爲不足憑信，同時，它還進一步向人們揭示出一條原則，即《史記》之類的典籍的記載可能有不够清楚、不够確切之處，但是，古代作僞的人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多，僞書現象也未必如某些學者所估計的

那麼嚴重。

近年來，李學勤先生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論述^④，是極有見地的。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竹木簡、帛書的重要價值不僅在於使人們看到了幾千年前文獻的真實情況，糾正了前人在古文獻研究中的某些錯誤的、草率的結論，更促使人們從方法論的角度反思疑古辨僞之學的適用範圍與程度。以往的學術界流傳過一個較有影響的說法，即古人缺少歷史觀念，於是，某些人會有意無意地造假作僞，以欺騙天下。所謂的劉歆僞造《左傳》就是其中典型個案。然而，古代造假者終究為個別現象，不能因劉歆整理圖書並重視某書，便視為其竄亂原文、造作僞書以欺世盜名。當時校書的不止其一人，與劉歆同校經傳的尚有尹咸^⑤，似乎還沒有根據將其定為造假的同夥吧。況且，認為一個人編造書便可以瞞過天下人耳目，甚至改變學術史和思想史的進程，這樣的論斷似乎將個人的作用看得過於大了，而對社會的力量也未免估計得過於小了。

清代學者主張無徵不信、孤證不立的治學原則。他們取得了足以超越前人的成就。王國維提倡“雙重證據”的研究^⑥，是他開創 20 世紀文學、史學研究新局面的關鍵之所在。在新的 21 世紀，在先秦文學文獻研究中，所應遵循的，依然是這樣的治學精神。

三、竹簡帛書對傳統校勘訓詁的衝擊

以竹簡、帛書為代表的出土文獻給予傳統的文獻學、先秦文學研究帶來了強而有力的衝擊。這些考古成就將新發現的最早的甚至是極有說服力的版本展示在人們面前。

在以往看來，有些重要典籍經歷了千百年的研究整理，似乎在校勘方面已經不存在問題了。但是，隨着大批秦漢以前的文獻從古墓中發掘出來，那些看似不存在校勘問題的典籍，也變得不

那麼可靠了。

如《詩經》雖有國家之分，但後世人大體上總是在毛詩的蔭底下探索古義、新解。可是，雙古堆竹簡《詩經》的發現却使人們不能不提出新的問題。

在經學家們看來，《詩經》是經聖人刪削過的經典，因此，這個典籍中記載的一切，甚至包括這個典籍的某些瑣屑問題也都具有俗輩們無法領會的意義。這裏僅舉詩篇排序和各國風的次第問題，以見一般。在今本《詩經》中，各國之詩的次第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然後爲雅、頌。對此，孔穎達有較全面的論述。其《毛詩正義》卷一云：“周、召，風之正經，固當爲首。自衛以下，十有餘國，編此先後，舊無明說。去聖久遠，難得而知。”然後，他經過多方面地分析指出，十五國風的排序，“是不由作之先後”，“不由國之大小”，“不由採得先後”。他認爲，“二三擬議悉皆不可，則諸國所次，別有意焉。蓋跡其先封、善否，參其詩之美惡，驗其時政得失，詳其國之大小，斟酌所宜，以爲其次。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千里之地。《柏舟》之作，夷王之時，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資母弟之戚，成入相之勳，文公則滅而復興，徙而能富，土地既廣，詩又早作，故以爲變風之首。既以衛國爲首，邶、鄘則衛之所滅，風俗雖異，美刺則同，依其作之先後，故以邶、鄘先衛也。周則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纔及郊畿，詩作後於衛頃，國地狹於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仍存，不可過於後諸侯，故使次之於衛也。鄭以史伯之謀，列爲大國，桓爲司徒，甚得周衆，武公夾輔平王，克成大業，有厲宣之親，有《緇衣》之美，其地雖狹，既親且勳，故使之次王也。齊則異姓諸侯，世有衰德，哀公有荒淫之風，襄公有鳥獸之行，辭有怨刺，篇無美者，又以大師之後，國土仍大，故使之次鄭也。魏國雖小，儉而能勤，踵虞舜之舊風，有夏禹之遺

化，故季札觀樂，美其詩音云：‘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故次於齊。唐者叔虞之後，雖為大國，昭公則五世交爭，獻後則喪亂弘多，故次於魏下。秦以秦仲始大，襄公始命，穆公遂霸西戎，卒為強國，故使之次唐也。陳以三恪之尊，食侯爵之地，但以民多淫昏，國無令主，故使之次秦也。檜則其君淫恣，曹則小人多寵，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邇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欲兼其上下之美，非諸國之例也。”這段闡述代表了儒家學者對其本門本派經典的吹捧與曲解。

可是，《詩經》中各國的次第和篇章的次第，却並非自古如此。《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聘魯，遍觀周樂。魯樂師為其所歌的詩，齊以前的次序與今本毛詩相同，齊以後依次為邠、秦、魏、唐、陳、檜等。自齊以下，杜預注中標明今本次第，且曰：“後仲尼刪定，故不同。”在杜預看來，《左傳》所記的次第屬於古本，而今本毛詩的次第，乃是孔子“正樂”而調整後的狀況。孔穎達也說：“諸國之次，當是大師所弟，孔子刪定，或亦改張。”^⑦於是，在經學家們看來，在孔子之後，這次第便也具有了非凡的意義。

雙古堆漢簡《詩經》的出土，證明了這些說法的背後無非是經學家們為了將《詩經》神聖化而強作解人。

漢簡《詩經》出土時，存在一些簡策相互疊壓現象。對此，整理者曾有所說明^⑧。以漢簡與傳本《詩經》相比較，有些疊壓現象較易於解釋，如《齊·敝笱》下壓《唐·蟋蟀》，考之傳本，二者前後相隔十篇。《緇衣》下壓《狡童》，二者皆為鄭詩，中間相距十一篇。《召南·殷其雷》下壓《邶·日月》，前後相距亦為十篇。此外，還有同篇自相疊壓的，如《邶·谷風》之四章下壓其第五章。這幾組相互疊壓的詩簡至少有一個共同點，即居上者，

在傳本中必在前，居下者必在後。

另外有些疊壓現象却不易從傳本中找到解答。如《邶·日月》既壓於《殷其雷》之下，其簡背復疊印出《召南·采蘋》之文，似乎《日月》列於《召南》之中。《邶·靜女》下壓《齊·載驅》，二詩相距六十三篇，如果說前面各組相隔十篇疊壓為正常之序的話，那麼，各國交錯，或相距六十三篇而疊印，則無法視為正常之序。又《邶·二子乘舟》與《鄘·干旄》並壓於《邶·燕燕》之上，似乎《干旄》也為邶詩。然而，《干旄》又疊印於《鄘·柏舟》之後，《二子乘舟》之二章下壓其首章。這些現象却無法從傳本中得到合理的解釋。

造成這樣複雜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某些詩篇的次第與今本不同。詩簡殘損較甚，其次第大多無從稽考。但有些疊壓現象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些蛛絲馬跡。如《柏舟》與《干旄》在傳本中，一居卷首，一居卷末第二篇。今在詩簡中相疊印，顯然在捆束之時，一居內，一居外，相隔當在三篇左右。同樣的，《緇衣》與《狡童》在傳本中相去十一篇，而在漢簡中相疊印，表明其次第也不同於傳本。

《周易》居儒家經典之首，而馬王堆帛書《周易》重見天日也給這部經書的研究帶來了新的課題。在帛書《周易》中，六十四卦的卦體和卦序同今本都有較大的出入，更不要說《易》傳中文字的差異了^⑨。與此相近的還有定州竹簡《論語》，也給二千餘年的儒家經學找了一些麻煩。

另外一些在流傳中產生過版本善否、文字正訛之爭的文獻，在出土文獻面前又要經歷更為嚴峻的檢驗。

現在人們所能看到的先秦典籍，多屬漢晉以後流傳下來的文本。這些文本中，脫文、錯簡、衍文、訛誤所在多有。人們針對這些問題，做了大量的校勘、整理工作，然而，因所據之本最早的也不過宋代人刊刻，其與先秦文學文本之原貌是否相合，並非

容易確定之事。《老子》一書中就有些引起爭議的千古懸案，如傳本第三十八章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無爲而有以爲。”對“下德”句歷來聚訟紛紜。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乙本發現之後，流傳中誤鈔、訛奪之事便較易於解決了。原來“下德”句在兩種帛書本中都不存在。顯然這是在流傳中竄入的文字。又傳本第六十五章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這也是頗多歧見的一章。實則治國“以智”、“不以智”是其關鍵。因此，對民來說，強調的應是“智”和“愚”，而不在於“智多”、智寡。考之帛書，甲本、乙本此句並作：“民之難治也，以其知（智）也。”可見在漢代鈔本中，此章並沒有引起歧義之處^⑩。帛書《老子》的重現是我們校正古籍，考鏡學術源流的重要參照，也是未來的道家研究得以突破前人樊籬的重要依據。

在這方面，張松如的《老子校讀》、陳鼓應的《老子注譯及評介》、高明的《帛書老子校注》、許抗生的《帛書老子注釋與研究》等，都以充分利用考古發現新成果而使其研究獨步學林。他們的學術實踐和成就表明，考古界已經爲先秦文學研究領域提供了很多最重要的、最早的文學版本，《詩經》、《論語》、《儀禮》、《周易》、《孫子》、《管子》、《晏子春秋》等重要的先秦典籍，如今都有了足可與之參互校勘的最早的鈔本。

在未來的先秦文學研究中，不應像以往那樣恪守家法，或僅僅依據宋代善本、清代精校本爲準的，而應斟酌傳本與竹簡、帛書本以定猶疑，別是非。若研究《老子》，仍以河上公之說爲旨歸，唯王弼之意是從，則未免昧於知古，其研究已經落後於 20 世紀後期，又何論新世紀。

四、新的文學文本與新的課題

竹簡、帛書中還有一些特別重要的發現，即在這些沉埋了二千年之久的古代文獻中，竟然有一些不為世人所知的文學文本，竟然有一些曾見於歷史記載，却久已失傳了的文獻。這些出土文獻的價值同以上所論及的簡牘、帛書乃至金文、甲骨文也有所不同。

在歷史上，有些曾經見於記載的著名人物、重大事件或歷史現象，在後來的歷史變遷中，與之相關的文獻失傳了。於是，這些歷史人物或事件就僅能通過有限的史料而得其仿佛。這就難怪人們產生疑惑，從而對史書記載的真實性和可信度發生動搖。

20世紀出土的簡牘、帛書中恰恰為世人提供了一些同上述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密切相關的文獻，證明了史書的記錄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可靠依據的。其中較為突出的當屬有關黃帝學說的文獻和有關著名軍事家孫武、孫臏的文獻。

據《史記》記載，西漢前期黃老之學盛行。這一學說成為當時決定國家政治的主導思想。它也給予當時的社會生活、文學藝術以很大的影響。如賈誼的賦中便體現出很明顯的黃老學的色彩。可是，如此重要的學派卻無法在傳世的文獻中進行考察、研究。這既令人產生疑問，也令學術界感到深深的遺憾。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大量珍貴文物，不僅是考古學方面的重大收穫，也是先秦文獻方面的巨大成就。在這一墓葬中發現了大批極具學術價值的文獻。其中有《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後定名為《黃帝四經》。這部書可能就是當時影響極大的黃老之學的重要文本之一部。因此，它一經整理、公布之後，便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方銘在其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學史》中，論述了《黃帝四經》在道家思想發展和論說體文學發展中的地位。余明光的《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也就此作了專門的研究。

又如《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載孫武以兵法十三篇見於吳王闔

間，見用後，助吳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又載孫臏見齊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後大破魏軍，誅龐涓，虜魏太子，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他們是春秋戰國間的著名軍事家。他們的事跡同當時重大的事件相關聯。而且，流傳於世的《孫子兵法》在古代軍事史上佔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可是，由於文獻或存或佚，致使後人對這兩位軍事家的真實性，對具有經典意義的《孫子兵法》的作者、時代，都產生了爭議。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竹簡近五千枚，其中重要的文獻有《六韜》、《尉繚子》、《管子》、《晏子春秋》等，尤爲可貴的是《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後兩部書的發現使以往的疑團煥然冰釋。同時，已經亡佚二千年的《孫臏兵法》也立即引起學者的關注。張震澤師積數年之功完成了《孫臏兵法校理》，實爲簡牘、帛書研究之力作。

在新發現的先秦文獻中，還有一些不曾見於記載的文本，如《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儒家者言》、《周易》後所附的幾篇傳論，還出土了兩篇賦：《神烏賦》、《唐革（勒）賦》。這些文本多不見於歷史記載。它們的重新出現，可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同時，也可補歷史記載之罅漏。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重現了先秦文學文本的真實面貌。這使它們具有了其它文本無法比擬的價值。

在 20 世紀後三十年間，對竹簡、帛書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很多學者表現出對此類文獻的特殊熱情，也創造出一些可喜的業績。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先秦兩漢文學研究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遠不如歷史學界那樣自覺，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還不够多。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的學術發展中，上述文學文本的重要性必將爲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人們將十分重視傳世文獻同出土文獻間的對照、補充和相互發明的關係，必將更多地運用出土文獻於校勘、訓詁中，必將從新發現的文本中開闢出衆多課題，通過各種形式發掘考古成果的史料價值、版本價值和文本價值。

注釋：

- ①王國維《靜庵文集續編·最近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
- ②錢玄同《重印新學偽經考序》。
- ③見李學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7 年。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 ④見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7 年版。
- ⑤見《漢書·楚元王傳》。
- ⑥見陳寅恪《王靜庵先生遺書序》，載《王國維遺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
- ⑦見《毛詩正義》卷一。
- ⑧見《阜陽漢簡〈詩經〉簡論》，胡平生、韓自強撰，《文物》1984 年第八期。
- ⑨見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增訂本），湖南出版社 1996 年。
- ⑩參見高明《帛書老子校注》，中華書局 1996 年版。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中文系